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演变^{*}

哈 全 安

内容提要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广泛政治实践，根源于现代化进程中新旧势力的消长和旧秩序的对抗，体现民众政治的崛起和民众参与的政治诉求。倡导现代伊斯兰主义的信仰原则、建立教俗合一的政治制度和遵循伊斯兰教法是穆斯林兄弟会始终坚持的基本纲领。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所处政治环境的变化，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目标和政治参与方式经历相应的发展过程。穆斯林兄弟会历经宪政制时代和共和制时代的不同阶段，政治环境的差异决定了民众政治参与的相应变化。从争取民族解放到致力于民主化运动，从崇尚暴力抗争到寻求合法的政党地位和积极参与议会选举，构成了穆斯林兄弟会演变的历史轨迹。

关键词 埃及 现代化进程 伊斯兰复兴运动 穆斯林兄弟会

作者简介 哈全安，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讲座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071）。

穆斯林兄弟会是 20 世纪埃及最具影响力的宗教政治组织，它的演变则是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穆斯林兄弟会的广泛实践，构成埃及现代化进程中民众政治参与的特定形式。它的崛起，标志着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在中东的滥觞。本文拟结合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时代新旧秩序剧烈变动的宏观背景，梳理穆斯林兄弟会的发展历程，探讨埃及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变动的历史轨迹，进而对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历史地位予以个案评价。

—

1923 年，福阿德国王颁布宪法，实行君主立宪制，埃及由此进入自由主义时代，议会选举和政党政治随之初露端倪。自由主义时代，宪政制度的建立与议会框架内政党政治的活跃，标志着埃及传统政治模式的衰落和现代政治模式的初步实践。然而，源于西方的宪政制度在 20 世纪初的埃及缺乏必要的历史条件，埃及宪政制度的社会基础局限于上层精英，国王与诸多议会政党的权力分享构成政治生活的核心内容，议会政治、政党政治与贵族政治具有三位一体的明显倾向。诸多政党作为埃及政坛的主导势力，其支持者主要来自地主、商人、企业家、官吏和知识界人士，只是上层精英操纵选举和角逐权力的政治工具，无意扩大政治参与和推动民主化的历史进程，具有明显的狭隘倾向和非民众性。自由主义时代前期，以华夫托党为代表的诸多政党与国王之间的权力角逐无疑是埃及政坛的突出现象。然而，即使华夫托党亦不代表真正意义上的民众政治参与，具有明显的非民主倾向和贵族政治的浓厚色彩。一方面，华夫托党所倡导的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仅仅将争取民众的支持作为角逐政坛的工具，其实质在于凌驾于民众之上和操纵民众运动的政治走向；另一方面，华夫托党的内部机制并不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重大项目“中东政治现代化进程研究”（2009JJD770023）的研究成果。

具有民主的性质,只是介于君主独裁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寡头政治。华夫托党领袖扎格鲁勒和纳哈斯在党内具有绝对的统治地位,而普通成员缺乏必要的政治参与,被排斥于决策程序之外。换言之,扎格鲁勒和纳哈斯控制华夫托党,华夫托党控制民众,所谓的政党政治具有自上而下的明显倾向,与遵循自下而上选举原则的现代政党政治以及成熟的民主政治相去甚远。

自由主义时代是埃及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阶段。随着传统经济秩序的衰落和社会裂变的加剧,下层民众渴望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以求保障自身的经济地位。进入20世纪40年代以后,埃及的政治生活经历贵族政治与民众政治此消彼长的明显变化。诸多政党对下层民众政治参与之强烈诉求采取排斥态度,导致下层民众对于贵族阶层主导的宪政制度丧失信心。随着下层民众的政治觉醒,民众政治悄然崛起,进而形成与贵族政治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激烈对抗。超越议会框架的政治参与构成民众政治的突出特征,而议会政治的非民众性导致民众政治的非议会性。区别于议会框架内的政党及其所代表的政治秩序而与民众政治的崛起密切相关的崭新政治倾向日益明显,旨在否定现存政治秩序的革命条件日渐成熟,新旧政治秩序的更替成为埃及历史的发展趋势。

自由主义时代前期,世俗色彩的宪政思想一度成为在埃及政坛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世俗政治和议会框架内的政党政治构成贵族政治的外在形式。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埃及民众与英国殖民统治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埃及的意识形态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价值取向逐渐由崇尚西方的世俗理念转变为回归传统的宗教理念,宗教政治和议会框架外的政党政治构成民众政治的表现形式。源于西方的世俗民族主义面临严峻的挑战,现代伊斯兰主义在埃及社会的政治影响明显扩大,进而成为埃及民众政治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时代后期,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穆斯林兄弟会成为民众政治挑战贵族政治的主要政治力量。与议会框架内的政党政治相比,穆斯林兄弟会的特点在于借助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形式,强调神权政治性、广泛群众性和圣战暴力性,旨在以宗教政治挑战世俗政治,以民众政治取代贵族政治。穆斯林兄弟会的兴起和发展,构成宗教政治的外在形式。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的抗争以及议会框架外的政党政治与议会框架内的政党政治之间的激烈角逐,根源于埃及社会内部的深刻矛盾,构成民众政治与贵族政治之间尖锐对立的逻辑结果。穆斯林兄弟会的滥觞,集中体现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广泛政治影响,进而构成自由主义时代后期埃及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民众广泛政治参与的历史形式。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泛滥和穆斯林兄弟会的广泛影响,预示着政治革命的即将到来。

哈桑·班纳是穆斯林兄弟会的创始人。班纳认为,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更是无所不包的完整思想体系,是指导人生各个领域的终极道路;伊斯兰教有两个取之不尽和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即《古兰经》和“圣训”;伊斯兰教是一种总体性的意识形态,为信仰者的个体和群体指出前进的方向和道路,制定万能的制度,制约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伊斯兰教是永恒的真理,适用于一切时间和空间。在此基础之上,班纳强调信仰的公众化与宗教的政治化,即伊斯兰教并非个人的信仰,亦非局限于内心世界,而是国家和社会的基本框架,是规范宗教、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最高准则,因此需要在各个方面加以实践,进而实现民族和国家的复兴。^①班纳继承贾马伦丁·阿富汗尼、穆罕默德·阿卜杜和拉希德·里达倡导的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反对盲从和守旧,强调创制的信仰原则,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②。从某种意义上说,班纳的思想与伊斯兰现代主义的思想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伊斯兰现代主义着眼于智力的觉醒,班纳则着眼于政治的实践。班纳援引早期伊斯兰时代的政治原则,反对君主专制,主张实现民众积极的政治参与。在班纳看来,早期伊斯兰时代无疑是伊斯兰世界的理想时代。然而,班纳倡导的现代伊斯兰主义并非追求早期伊斯兰时代社会模式的重新构建,而是强调早期伊斯兰时代的政治理念与现代社会秩序的完美结合。

1928年,班纳创建穆斯林兄弟会。1935年,穆斯林兄弟会第三次大会确定班纳成为总训导师和

① Botman, S., *Egypt from Independence to Revolution 1919-1952*, New York, 1991, p. 121.

② Wendell, C., *Five Tracts of Hasan Al-Banna (1906-1949)*, Berkeley, 1978, p. 4.

最高权威^①。班纳认为：穆斯林兄弟会“继承了伊斯兰教的全部美德和各种不同成分，是萨莱菲叶的信息、逊尼派的道路、苏菲主义的真理和社会理想的体现”。班纳看来，穆斯林兄弟会不是慈善协会，也不是政党，而是代表埃及民族的精神和灵魂^②。然而，穆斯林兄弟会具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完整的组织体系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包含现代政党的诸多要素。穆斯林兄弟会的基本目标是：实现民族和解，巩固伊斯兰世界特别是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团结，坚持伊斯兰教的立法原则，复兴伊斯兰教信仰和阿拉伯文化，结束党派斗争，强化武装力量，消除腐败，建立教俗合一的国家秩序，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实现埃及的主权独立，保障民众的权利，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发展民族经济，改善下层民众的生活环境。^③ 穆斯林兄弟会宣称“安拉是我们的目标，《古兰经》是我们的宪法，使者是我们的领袖，圣战是我们的道路，为主而战是我们最崇高的愿望”，“我们的基本目标是解放外国政权统治下的伊斯兰土地，在伊斯兰的土地上建立自由的伊斯兰国家”^④。“信仰兴则民族兴”作为穆斯林兄弟会的思想纲领，包含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穆斯林兄弟会的兴起无疑突破了自由主义时代议会政治和贵族政治的框架，标志着埃及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党政治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浓厚的宗教色彩和诉诸神权的政治形式构成穆斯林兄弟会作为新兴政党的明显特征。

穆斯林兄弟会在初建阶段致力于传播信仰、普及教育、弘扬伊斯兰文化和从事慈善事业，旨在培养正确理解伊斯兰教的新一代穆斯林。此时的穆斯林兄弟会尚未涉足政坛，政治立场亦颇显温和。自30年代后期开始，贵族政治日趋保守，民众政治与贵族政治之间的矛盾对立明显加剧，议会框架内的政党政治危机四伏，穆斯林兄弟会作为民众政治挑战贵族政治的主要载体随之逐渐转变为崇尚暴力的激进政治组织。班纳援引《古兰经》和“圣训”，强调圣战是穆斯林不可推卸的宗教义务。与此同时，穆斯林兄弟会人数迅速增加。至二战后期，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多达数十万人。下层民众的政治觉醒以及世俗政治的衰落和议会框架内政党政治的危机，构成穆斯林兄弟会长足发展的深层背景。农民、士兵和包括工人、学生、职员在内的城市下层的支持，为穆斯林兄弟会的发展提供了更广泛的社会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埃及面临经济萧条和政治动荡的严峻局面，失业率上升，物价飞涨。王室和贵族继续垄断国家的权力和财富，诸多议会政党无视下层民众的利益和要求。埃及战后特定的历史环境导致激进政治的空前高涨，下层民众的世俗激进政治组织纷纷出现，而穆斯林兄弟会成为埃及最具影响力的激进政治组织。1945~1948年是穆斯林兄弟会发展的鼎盛时期，由它发起和组织的民众示威和其他政治运动，以及它发行的报刊和出版的书籍，在当时的埃及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巴勒斯坦战争期间，穆斯林兄弟会势力的急剧膨胀，严重威胁着法鲁克国王的统治地位。巴勒斯坦战争之后，法鲁克国王将打击目标由华夫托党转向穆斯林兄弟会。努克拉什政府在埃及实行军事管制，宣布取缔穆斯林兄弟会，逮捕其成员并没收财产。努克拉什随后遭到穆斯林兄弟会激进分子的暗杀，班纳亦在不久之后遭暗杀身亡。班纳死后，穆斯林兄弟会的势力逐渐削弱。1950年华夫托党重新执政后，才逐渐恢复穆斯林兄弟会的公开活动。1951年，哈桑·侯戴比当选为穆斯林兄弟会的总训导师。^⑤

二

纳赛尔政权建立后，取缔反对派政党，解散穆斯林兄弟会，自由军官组织的政治势力急剧膨胀，成为埃及政治舞台的核心群体。纳赛尔作为总统，位于国家权力的顶点，凌驾于社会之上，是埃及民

① Lia, B., *The Society of the Muslim Brothers in Egypt 1928-1942*, Oxford, 1998, pp. 43, 98.

② Wendell, C., op. cit., p. 36.

③ Amin, C. M., *The Modern Middle East: A Sourcebook for History*, Oxford, 2006, pp. 69-71.

④ Wendell, C., op. cit., p. 31.

⑤ Dekmejian, R. H., *Islam in Revolution: Fundamentalism in the Arab World*, New York, 1995, p. 77.

众心目中“仁慈的君主”。由此形成的后果是，政治体制与民众政治需求严重脱节，民众政治参与微乎其微，政府与民众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渠道，国家与社会处于对立的状态。

“七月革命”前夕，穆斯林兄弟会与自由军官组织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双方是重要政治盟友。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与推翻法鲁克国王专制统治的共同目标，无疑是穆斯林兄弟会与自由军官组织建立联盟的政治基础。但“七月革命”胜利后，两者建立联盟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进而分道扬镳。穆斯林兄弟会挑战自由军官组织的统治地位，试图与之分享国家权力，成为纳赛尔政权面临的潜在政治威胁。但是，穆斯林兄弟会与自由军官组织之间的矛盾冲突并非源于所谓政治理念和发展目标的根本分歧，亦非宗教与世俗的对抗^①，而是权力角逐的逻辑结果。自由军官组织的世俗化政策，成为纳赛尔时代强化极权政治的举措。所谓的政治伊斯兰化倾向，则是穆斯林兄弟会要求实现政治参与和分享国家权力的手段。1954 年，政府指责穆斯林兄弟会反对“七月革命”，进而下令解散该团体，超过 6 000 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囹圄入狱，其中 21 人于 1957 年被政府处决^②。尽管如此，纳赛尔政权无意排斥伊斯兰教，着力强化官方伊斯兰教的主导地位，进而将官方伊斯兰教作为控制民众的政治工具。“1952 年革命后，清真寺的数量明显增多。政府建立新的宗教广播电台，发起创办伊斯兰大会和伊斯兰研究会，以法律的形式维护爱资哈尔的权威地位，将伊斯兰教作为学校考试的必修科目……爱资哈尔与纳赛尔政权保持广泛的合作，教界上层不断发布支持政府的宗教法令。纳赛尔及其同僚与原教旨主义者在宗教领域展开角逐，原教旨主义者难以将纳赛尔主义诋毁为无神论的意识形态。穆斯林兄弟会与纳赛尔之间的真正分歧在于国家权力的归属”。1964 年，纳赛尔政权颁布大赦令，释放穆斯林兄弟会囚犯，旨在争取宗教势力的支持，抵制左翼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许多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官复原职，甚至获得政府给予的经济赔偿。1965 年，纳赛尔政权再次发起清洗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运动，近 3 万人遭到囚禁，数十人被处死。^③

纳赛尔时代，穆斯林兄弟会长期处于低谷，其领导人或被处死，或被关押在开罗南郊的图拉监狱。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塑造了穆斯林兄弟会的极端思想，赛义德·库特卜成为此间穆斯林兄弟会极端思想的代表人物。库特卜早年曾经追随扎格鲁勒和纳哈斯，1945 年退出华夫托党，1951 年加入穆斯林兄弟会，1954 年入狱，1966 年被纳赛尔政权处死。赛库特卜所著《路标》一书，在继承班纳以及阿布·阿拉·毛杜迪的现代伊斯兰主义理论的基础之上，着力阐述极端倾向的政治思想。库特卜强调伊斯兰教与民众自由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强调安拉的绝对主权，质疑纳赛尔政权的合法性，声称纳赛尔政权奉行的世俗政治背离伊斯兰教的基本准则而无异于查希里叶时代的蒙昧制度。库特卜声称，伊斯兰教并非只是内心深处的信仰，而是人类摆脱奴役状态的政治宣言；伊斯兰教否认盗用安拉名义的世俗权力和世俗统治，世俗统治者盗用的权力必须归还安拉，盗用安拉权力的世俗统治必须被推翻。库特卜认为，实现安拉主权的目的并非建立教界的统治，而是恢复伊斯兰教法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进而保障民众摆脱奴役和获得解放；实现安拉主权的途径并非只是信仰的说教，而是应当诉诸圣战的暴力方式^④。库特卜进而指出，“今天存在于大地上的所有社会确已进入蒙昧社会的范畴之内”，自由主义时代的埃及民众尚有一定的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而纳赛尔政权彻底剥夺了民众的自由，信仰的传布只能诉诸圣战的方式^⑤。与班纳相比，库特卜完全否定现存的秩序，强调将“战斗的伊斯兰”作为穆斯林兄弟会的意识形态，思想倾向颇显极端。库特卜阐述的极端政治思想，可谓纳赛尔时代特定政治环境的产物和极权政治的逻辑延伸。

① 曲洪著《当代中东政治伊斯兰：观察与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14 页。

② Kepel, G., *Muslim Extremism in Egypt: The Prophet and Pharaoh*, Berkeley, 1993, p. 27.

③ Rubin, B., *Islamic Fundamentalism in Egyptian Politics*, New York, 2002, pp. 12, 15.

④ Khater, A. F., *Sourc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Boston, 2004, pp. 324 - 330.

⑤ Lapidus, M. A., *A History of Islamic Societies*, Cambridge, 1988, p. 634.

三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埃及处于从国家资本主义向自由资本主义转变的历史阶段，其突出特征在于旧的秩序趋于崩溃而新的秩序尚未确立。新经济政策的受益者只是少数人，下层民众丧失旧秩序提供的社会保障，而尚未被纳入新秩序的社会保障体系，普遍处于孤立无助的贫困状态。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贫富差异日趋扩大，社会分化明显加剧。乡村人口离开土地而涌入城市，却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处于游离状态，缺乏必要的经济保障和政治权利。青年人就业无门，前途渺茫，亦心存不满。贫富分化的扩大、物价的上涨和失业率的居高不下，加剧着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伊斯兰教反对贫富不均和倡导社会平等的信仰原则在下层民众中广泛传播，成为他们寻求精神安慰的意识形态，清真寺则提供了庇护下层民众的重要社会场所。越来越多的人身着传统伊斯兰教服饰，但并非发思古之幽情，意在发泄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不满，进而挑战世俗政权的统治地位。安拉的统治取代法老的统治以及实践《古兰经》的信仰原则和重建先知时代的神权政治，成为改变现存社会秩序的基本纲领。伊斯兰教的政治化，则是改变现存社会秩序的理论武器。穆斯林兄弟会作为伊斯兰反对派政治组织，在下层民众具有广泛的政治影响，蕴含着民众动员的巨大潜力。

萨达特时代，埃及的政治力量重新组合，极权主义的政治模式出现衰落的征兆，民主和人权成为萨达特标榜的政治纲领，政治生活的自由化倾向渐露端倪，政治环境较纳赛尔时代相对宽松。萨达特政权解除纳赛尔时代的禁令，释放了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萨达特曾经将纳赛尔时代称作唯物主义的时代，世俗主义的原则构成纳赛尔时代埃及政治生活的突出特征。相比之下，自萨达特时代开始，埃及社会的宗教氛围日渐浓厚，伊斯兰复兴运动呈上升趋势，穆斯林兄弟会重新崛起，进而形成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的激烈角逐。70 年代初，萨达特政权实行宽容的宗教政策，与穆斯林兄弟会处于合作的状态。穆斯林兄弟会由于与纳赛尔政权积怨甚深，因此拥护萨达特政权的非纳赛尔化政策。萨达特政权则试图借助于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遏制和削弱世俗色彩的纳赛尔主义残余势力，强化新政权的社会基础。然而，萨达特政权沿袭纳赛尔时代的传统，坚持教俗分离的政治原则，强调“宗教中无政治，政治中无宗教”^①。穆斯林兄弟会要求取得作为政党的合法地位并参与议会竞选，萨达特政权则明确否认兄弟会具有合法政党的地位，只允其成员以个人身份参加世俗政党和从事政治活动。70 年代后期，萨达特政权与穆斯林兄弟会之间的关系逐渐恶化，进而分道扬镳。1977 年，穆斯林兄弟会抨击萨达特出访耶路撒冷，反对埃及与以色列单独媾和。1978 年，穆斯林兄弟会谴责埃及政府与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是背叛伊斯兰教信仰和出卖阿拉伯民族利益的行为。1979 年，穆斯林兄弟会支持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抗议埃及政府向伊朗国王巴列维提供政治避难。与此同时，萨达特政权开始谴责穆斯林兄弟会是埃及的国中之国，进而逮捕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接管其控制的清真寺并取缔其主办的报刊，穆斯林兄弟会与萨达特政权的紧张关系骤然加剧。

四

穆巴拉克出任总统以后，以民主化进程的推动者自居。穆巴拉克表示无意垄断国家权力和谋求延长总统任期，宣称民主制是国家前途命运的保证，国家权力属于全体公民。^②与此同时，诸多反对派政党相继重返埃及政坛，政治生活的多元格局日渐凸显。穆斯林兄弟会的社会基础亦发生变化，民间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逐渐成为穆斯林兄弟会内部崭新的社会力量。政治环境的宽松和社会基础的变化

^① Baker, R. W., *Sadat and After: Struggles for Egypt's Political Soul*, London, 1990, pp. 244, 248.

^② Kassem, M., *Egyptian Politics: The Dynamics of Authoritarian Rule*, Boulder, 2004, pp. 26 - 27, 54.

决定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穆斯林兄弟会的思想纲领趋于温和，而其政治实践包含诸多新兴社会阶层挑战极权政治和官僚资产阶级之特权地位的明显倾向。

穆巴拉克时代，穆斯林兄弟会的主流派别具有相对温和的政治色彩，主张放弃暴力，寻求合法的斗争方式，声称穆斯林兄弟会坚持议会民主制的政治原则。在此基础之上，穆斯林兄弟会的主流派别致力于政党政治，积极参与议会竞选。实行自由经济政策、创造私人投资的良好环境、改善财富分配体系、抑制社会成员的贫富分化和保障公民权利，成为穆斯林兄弟会参与议会竞选的基本纲领。^① 穆斯林兄弟会以及为数众多的伊斯兰志愿者协会和伊斯兰投资公司倡导伊斯兰主义的原则，开办和经营银行、公司、企业、学校、医院、农场和媒体，在金融服务、就业培训、社会福利、教育卫生和其他公共服务业领域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广泛的社会影响。穆斯林兄弟会的总训导师哈桑·侯戴比声称“我不坚持立党，但是坚持进行政治活动和民众活动。如若国家实行政党制，又认为适用于我们，那么我们就是政党”。^② 继侯戴比之后出任穆斯林兄弟会总训导师的欧默尔·泰勒迈萨尼则明确表示“我们进入议会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主张通过议会竞选的形式角逐国家权力，进而实现改变现存社会秩序的政治目的。1987 年，穆斯林兄弟会的新任总训导师穆罕默德·阿布·纳斯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告诉记者“在过去的 30 年，自由军官政权利用报刊和图书诋毁穆斯林兄弟会，将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人形容为杀手，进而欺骗民众”，“民众现在目睹我们的行为……证明自由军官政权的诋毁只是欺骗民众的谎言”。^③ 在同年举行的议会选举中，穆斯林兄弟会甚至删除“圣战是我们的道路，为主道而战是我们最崇高的愿望”作为争取民众支持的政治纲领，“把选票投给安拉，把选票投给穆斯林兄弟会”成为穆斯林兄弟会新的竞选口号。^④

80 年代，穆斯林兄弟会的主流派别与穆巴拉克政权处于合作状态。穆巴拉克政权一方面否认穆斯林兄弟会具有合法政党的地位，另一方面允许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从事政治活动和参加议会竞选。1984 年，埃及举行议会选举，穆斯林兄弟会与新华夫托党建立竞选联盟，获得 57 个议会席位，其中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获得 9 个议会席位。议会选举的积极参与，标志着穆斯林兄弟会开始成为具有合法地位的反对派政治力量，议会随之成为穆斯林兄弟会角逐国家权力的重要舞台。1987 年，穆斯林兄弟会与社会劳动党、自由社会主义党组成竞选联盟，获得 60 个议会席位，其中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获得 38 个席位，超过新华夫托党所获得的 35 个议会席位。^⑤

进入 90 年代，穆斯林兄弟会与穆巴拉克政府的关系逐渐恶化。穆斯林兄弟会的主流派别公开指责穆巴拉克政府压制民主、执政党一党独大和缺乏公正选举，要求获得作为政党的合法地位。1995 年议会选举前夕，穆斯林兄弟会总部被政府关闭，81 名穆斯林兄弟会重要成员被指控属于非法组织和从事恐怖活动而遭到逮捕，其中 54 人被军事法庭判处监禁。^⑥ 在随后举行的议会选举中，穆斯林兄弟会仅仅获得 1 个议会席位。^⑦ 90 年代后期，穆巴拉克试图通过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对话，扩大民众的政治动员，寻求广泛的政治支持，共同对抗伊斯兰主义的挑战。然而，政府拒绝与反对派讨论诸如宪政和政治改革等敏感问题，对话无果而终，埃及国内的政治暴力随之出现明显上升的趋势。^⑧ 尽管如此，穆斯林兄弟会的主流直至世纪之交依然致力于争取成为官方认可的合法政党，坚持在宪法和现行法律的框架内从事政治参与的相关活动。

① Marr, P., *Egypt at the Crossroads: Domestic Stability and Regional Role*, Washington, 1999, p. 52.

② 杨灏城、朱克柔主编《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宗教与世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 375 页、377 页。

③ Rubin, B., op. cit., p. 25.

④ Springborg, R., *Mubarak's Egypt: Fragmentation of the Political Order*, Boulder, 1989, p. 218.

⑤ Ibid., p. 218.

⑥ Wickham, C. R., *Mobilizing Islam: Religion, Activism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Egypt*, New York, 2002, p. 215.

⑦ Al-Mikawy, N.,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gypt*, p. 55.

⑧ Ismeal, T. Y., *Middle East Politics Today: Government and Civil Society*, Florida, 2001, p. 441.

进入新世纪，穆斯林兄弟会的世俗化成为埃及民众政治运动的新动向。穆斯林兄弟会调整政治策略，淡化宗教色彩，制定温和务实的政治策略，强调民主制和多元化的政治原则，强调伊斯兰教的舒拉原则与现代政治之多元化以及民众主权的同一性，主张与其它政治派别展开对话，支持多党制的竞选制度，承认妇女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承认非穆斯林享有与穆斯林同等的政治权利，反对宗教歧视、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穆斯林兄弟会与诸多世俗反对党之间尽管不无分歧和矛盾，却有共同的政治诉求，旨在挑战执政党民族民主党的权力垄断、穆巴拉克总统的独裁统治、争取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和权力分享的政治空间，现代伊斯兰主义与世俗自由主义之政治立场日渐趋同。

2000年的议会选举处于司法机构的监督之下，政府被迫减少对于议会选举的干预，进而导致选举结果的变化，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支持的独立候选人获得17个议会席位，构成议会内部最大的反对派^①。在2005年议会竞选期间，政治环境出现进一步开明的迹象，竞选者获准批评政府和总统本人。穆斯林兄弟会支持的独立候选人获得88个议会席位，再次成为仅次于执政党的第二大政治派别。^②2005年以后，官方实施高压政策，政治环境出现逆转的迹象。在2010年举行的议会选举中，执政党民族民主党以压倒性的绝对优势获得420个席位，反对派仅获得15个席位，而穆斯林兄弟会未能获得议会席位。官方操纵的议会选举，加速了民众表达自身政治诉求的方式从投票站走向街头和广场的步伐，进而引发声势浩大的抗议和示威浪潮。2011年初历时18天之久的全国性抗议活动，声势浩大，动辄数以十万计的各阶层民众涌上街头，加入示威的队伍，绝非乌合之众所为。穆斯林兄弟会尽管尚未取得作为政党的合法地位，却具有庞大而完整的组织体系，在诸多社会群体特别是下层民众中产生极其广泛的影响。穆巴拉克的独裁统治成为矛盾焦点和众矢之的，共同的政治目标导致教俗各界的广泛政治联合。相比之下，世俗色彩的诸多反对派政党所获得的议会席位大幅下降。

结 语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演变历程表明，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旨在借助回归传统的宗教形式而倡导平等和民主的政治原则，体现民众政治的崛起和民众广泛政治参与的强烈诉求，蕴含着民众政治动员的巨大潜力。政治体制与民众政治参与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不同的政治环境决定着民众政治参与的不同方式，而崇尚暴力和诉诸极端手段并非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固有属性。倡导现代伊斯兰主义的信仰原则、建立教俗合一的政治制度和遵循伊斯兰教法，无疑是穆斯林兄弟会始终坚持的基本纲领。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所处政治环境的变化，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目标和政治参与方式经历相应的发展过程。自由主义时代，英国殖民统治的延续严重阻碍着埃及的现代化进程，民族矛盾日趋高涨。特定的政治环境赋予穆斯林兄弟会的早期政治实践以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和激进倾向，争取埃及的民族独立成为穆斯林兄弟会在自由主义时代的首要政治目标。纳赛尔时代，极权政治空前膨胀。赛义德·库特卜阐述的极端政治思想，可谓纳赛尔时代特定政治环境的产物和极权政治的逻辑延伸。后纳赛尔时代，极权政治出现衰落的征兆，民主化进程逐渐启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立场随之日趋温和，议会竞选的积极参与成为穆斯林兄弟会之主流势力角逐政坛的首要方式。从争取民族解放到致力于民主化运动，从崇尚暴力抗争到寻求合法的政党地位和积极参与议会选举，构成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之政治目标和政治参与方式的历史轨迹。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

^① Wickham, op. cit., pp. 219 - 221.

^② EIU, *Country Profile 2008: Egypt*, London, 2008, p. 11.

The Evolution of Egyptian Muslim Brotherhood

Ha Quanan

pp. 25 – 31

The broad political practice of Muslim Brotherhood in Egypt rooted in the growth and decline of the old and new forces and the rivalry of old and new order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and it also reflects the rise of the public politics and the political appeal of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The Muslim Brotherhood experiences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era of the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nd the

republican. Differences in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determine the changes accordingly in the public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processes from committing to fighting for national liberation to democracy movement, as well as from violent protests to the advocacy for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constitute the history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Muslim Brotherhood.

An Assessment of Islam and its Impact on Political Change in Senegal

Li Wengang

pp. 50 – 58

Islam in Senegal has close relations with political evolution. Although the relatively harmonious and subtl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Senegal which originated from the French colonial rule, it has still much to do with the policies of Senegal's post – independence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leaders. The Islamic religious system with characteristic of Sufi Muslim Brotherhoods provides the basis for this relationship. With the changing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s, religious system in Senegal is also changing; meanwhile, since the 1990's, Islamic Fundamentalism has been active in Senegal. Therefore, Islam will exert more uncertain influences on politics in Senegal. For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leaders in Senegal, it seems to be an eternal and more puzzle issue to keep such subtle political – religious relationship in recently years.

The Indian Issue in South Africa and India's Policy towards South Africa in Nehru Era

Xu Guoqing

pp. 65 – 72

Considering of the national sentiment,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Nehru government of India and South Africa's White Regime was getting worse for discrimination and exclusion on Indians. Based on India's independent experience, economic and military strength of the constraints, the Nehru government of India began to resist the apartheid system in South Africa with means of supporting the resolut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embargo and suspens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and other “non – violent”

means, in terms of India's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level. Such “non – violent” resistance policy has significant meaning for gathering world public opinion against racial system and in support of the liberation struggle. With the strengthening of South Africa's apartheid policy, deepening of national independence movement in Africa and other factors such as the influence of the border conflicts of Sino – Indian, it has become inevitable for changing India's “non – violent” resistance policy against the White Regime in South Africa.